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開辦



江西人民
出版社

6

五四时期的抉择

杨慧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时期的抉择/杨慧清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8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江流)

ISBN 7-210-01622-8

I. 五…

II. 杨…

III. 理论专著,思想史,五四—政治

IV. D09.6

五四时期的抉择

杨慧清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千 印数:2000册

ISBN 7-210-01622-8/D·222 定价:12.5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5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江 流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副 主 编 王太华 卢之超 靳辉明

编 委 王太华 王正萍 卢之超
江 流 许征帆 何建章
陆学艺 赵 曜 桂晓风

靳辉明 熊向东

编辑组长 林学勤 周榕芳

常务编辑 邓光东 徐建国

总 序

江 流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经各方努力,历时三载,现已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套大型丛书,分为两部,一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另一部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运动与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性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迫切需要。

恩格斯有一句至理名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36页)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如同其他科学学说一样,服从思想理论体系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深入,赋予它勃勃的生机和恒久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因此,人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以科学的、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并且在充分研究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这个结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他们总是不断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地总结

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后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恩格斯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出现垄断现象后对资本主义新特征的洞察,以及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成果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巨著的重大影响等,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朽功绩还在于,他们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们正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通过研究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

20世纪初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40年代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跃进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新阶段。如果说马恩时期,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要还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作为革命运动,主要还是无产阶级推翻旧社会,以求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那么,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则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其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实践。研究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总结其实践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强调对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的研究。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66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8页)列宁正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下的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历史告诫人们,不但要重视对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的研究,还

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点更为重要。

我们记得，在对待斯大林功过的评价上，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否定一切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他不是从复杂的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历史地、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科学地总结和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而是把斯大林时期苏共所犯错误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和他的品质，从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历史。这种错误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对待前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问题上，走的是赫鲁晓夫的老路，而且走得更远。他把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看成是由少数个人造成的，并且否定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把前苏联几十年的历史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这种做法，无疑是抽掉自己的立足石，必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理论上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他借口研究新情况，提出了所谓“新思维”，但这种新思维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与赫鲁晓夫们相反，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对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问题上采取了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认为，赫鲁晓夫“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一下子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必须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高度研究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来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

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犯错误，甚至遭受严重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要善于总结，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得出正确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这一点。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找到了日后前进的正确轨道。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需要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自我完善,需要不断地改革那些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政治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表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如何认识时代特征,如何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如何认识社会实践出现或提出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他曾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开创性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的科学研究,就不会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就不会有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总方针的确立。我们党和人民也正是从历史的比较和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中,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迈向21世纪的光辉旗帜。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在它前进的每一步,在它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进行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对社会主义实践

及其经验的科学研究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反过来又给予社会主义实践以科学的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以研究为中介的相互统一和相互促进中,社会主义事业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冲破种种艰难险阻而蓬勃发展。

当前,社会主义研究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既要研究中国,又要研究世界;既要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又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更要研究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当然,核心和重点是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理解这一问题时,重温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是十分有教益的。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533页)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虽然已经讲过50多年,但其基本精神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任务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理论。即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广泛的现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特别要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研究历史经验。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这么深刻。三是研究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当今世界的变化错综复杂,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各种矛盾在交织演化。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纷至沓来,许多情况的面孔是我们很陌生的,很不熟悉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关注当前实际的发展变化,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及社会实践发展的趋势,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这种研究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复杂艰巨的工程,不是单靠理论工作者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各方面的同志合力来完成。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对进行这一研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自酝酿之时起,就意在突出研究特色,着眼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研究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地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套系列丛书是为推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而著作和出版的。我们希望它的问世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

1993年12月于北京

前 言

中国是在 50 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而最初的定向却是在五四时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脚,同时成为事实的。因此,如果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话,那么,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就不能不探究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选择。

冠以“选择”或“抉择”二字,并非随意。五四时期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选择: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瞄准了社会主义;以胡适、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仍坚持资本主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择取科学社会主义以前,还曾经对各种社会主义作过研究和鉴别,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思想论争。在实际行动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有很强的选择意识。以陈独秀为例,1920 年底,他曾这样强调:

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①

① 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8 卷 4 号,1920 年 12 月 1 日。

1921年1月,陈独秀又说: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①

其实,这种有意识地进行选择不是在五四时期才出现的,整个近代都处在不断选择中。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已经朦朦胧胧地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要求,但因封建专制统治仍占绝对优势,没有形成气候。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执意于君主立宪制,并发动了戊戌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民主立宪制,进行了辛亥革命;许多小资产阶级,有主张社会主义的(大都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以满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则仍然坚持封建专制;1906年、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还发生了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的大论战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各阶级在实际行动上的选择。从思想意识上看,甲午战争前,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冯桂芬所提出的“鉴诸国”等,已显示了近代中国最初的选择意识。甲午战争后,选择意识就明显化了。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选择意识。其他如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也都在阐述自己的政见时,无不强调了选择的重要。

1901年,梁启超曾指出:“天下之政体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因此他强调:“别择性”是中国变革者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德性”,是“政治家之魂”;变革社会的带头人,“苟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其负国民也实甚”^②。

康有为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以“神农”自居,作欧洲11国之游,就是为了“遍尝百草”,为中国采择“神方大药”。如其所谓“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抒右撷,大嚼横吞,其安能不别良莠、察宜否、审方制药,以

①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州群报》,1921年1月19日。

②《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①

孙中山于1905年曾告诫留日学生：“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②1906年，他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③

上述的种种选择，是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即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近代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必然要调整自己的社会秩序，以适应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世界各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整体化趋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④近代中国人强烈的选择意识以及不断地选择和变革，正是世界整体化趋势在中国的必然反映。

具体的情况则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面临社会大变革的中国，由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除原有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外，又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从而也就使得中国各阶级——无论是原有的地主、农民阶级，还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内忧外患、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要拿出各自的应变之策或救国方案。而各种政见、主张的相互致对、冲突或差异、分歧，就会促使人们去鉴别和择选。再者，由于中外交往面的扩大，进入人们视野的社会模式、经验和思想也就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各阶层就不能不考虑哪个更合适，就不能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鉴别、挑选，乃至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等等。

①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6页。

②《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

③孙中山：《覆鲁塞尔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近代中国的选择意识及其实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还要说明的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所有选择和变革,包括开明地主的、农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皆因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是,它们每一次都程度不同地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每一次都为下一次的选择和变革准备了条件。比如“洋务运动”,它表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地主阶级中开明分子的选择,即物质开新的封建专制。因为它本质上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对立的,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致富致强、抵御外侮的目的,但它却促生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这就为戊戌变法运动准备了物质、阶级条件。再如,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从而也就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这种环环相扣、层层衔接的各种选择和变革,实际上从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物质的与精神的发展,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提高了整体的实践与认识水平,从而也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总的由浅入深的选择和变革过程。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选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的。它虽然是中国的事,却牵连世界;虽然出现在五四时期,根系却在整个近代;看似主观人为,实则有着一定的物质、历史基因;它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择,在于它有着近代中国几代人的实践与认识的积累。

因此,要研究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选择,就必须兼顾中国乃至世界、五四时期乃至整个近代、实践乃至认识、物质乃至思想文化。如此,才能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现象,客观地剖示其根由以及深刻地总结其认识上的经验教训。

以上基本思路,决定以上、中、下三篇来指陈,即“社会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与近代中国”;“通往社会主义选择的思维轨迹”。是为前言。

杨慧清

1993年5月于

河南大学历史系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篇 社会主义选择

引 言	(1)
第一章 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潮	(3)
一、“社会改造”和“新思潮”	(3)
二、社会主义知多少(一)	(7)
三、社会主义知多少(二)	(15)
四、“旁通博采”、“比较各派”	(18)
第二章 论争、实验、选择	(21)
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21)
二、“工读互助团”的实验	(26)
三、“社会主义讨论”	(32)
四、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	(39)
五、“一锤定音”	(45)

中篇 社会主义选择与近代中国

引 言	(51)
第三章 面临变革和选择	(53)
一、中国的内部变异	(53)
二、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	(59)
第四章 且择且变的历程	(64)
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前	(64)
二、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	(76)
第五章 历史的客观需求	(92)
一、中国的问题	(92)
二、历史的可能性	(96)
第六章 机缘会通	(101)
一、世界新趋势	(101)
二、民族再觉醒	(104)
三、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105)
四、思想大解放	(107)

下篇 通往社会主义选择的思维轨迹

引 言	(110)
第七章 “寻找真理”与“赶超”意识	(111)
一、中西比照下的落后感	(112)
二、中华文明、东方大国的自尊和自信	(116)
三、民族危机中的急迫感	(120)
四、赶超意识及其认识基础	(124)
第八章 资本主义信念的动摇	(130)
一、新旧思想	(131)
二、对世界局势及“世纪末”思潮的反应	(141)
三、理论观念的转变	(151)
第九章 传统文化的精神呼应	(163)
一、洪秀全的“上帝天国”	(164)
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	(166)
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171)
四、无政府主义	(174)

五、“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179)
第十章 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	(188)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条件或原因	(188)
二、研究、接受、理解	(195)
 结 语	 (211)
 主要参考书目	 (216)